

近代以来日本文明观的变迁

杨栋梁

(南开大学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日本研究院,天津 300071)

【摘要】 近代以来,原本“以中华为是”的日本传统文明观,先后经历了“脱亚入欧”、“脱欧归日”和“脱日入美”的三次转换。尽管每次“转换”都具有某种“质变”的意义,但新文明观的确立并不意味着传统文明观的泯灭,当“入欧”、“入美”取得成效之时,往往也是“发现”传统、试图再造日本式“新文明”的起点。日本的文明观转换留给世人的重要警示是:逆境时知耻而后勇,与时俱进以调整和更新落后观念,则后进者可以奋起直追;顺境时不骄不躁,理性地看待自我和他者,则国家、民族可以长盛不衰。

【关键词】 近代日本;文明观;“脱亚入欧”;“脱欧归日”;“脱日入美”

【中图分类号】 K31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09(2016)01-0120-07

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一般把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性成果称作物质文明,把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过程中取得的精神性成果称作精神文明,二者互为表里,共同推动了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向更高层次攀升。文明观则是认识主体对文明的自他认知和态度,是一种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也是决定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发展方向或路径选择的思维前提。

人类古典文明的生成至少有3500年以上的历史,大航海时代揭幕的近代文明则已走过5个多世纪历程。日本与欧洲近代文明的邂逅如果从1543年葡萄牙商船漂流到种子岛算起,也已接近500年时间。从那时起,在传统文明与近代文明的相遇、碰撞、融合与互动中,日本对文明的认知和态度发生了哪些变化,导致其文明观变化的主要是哪些因素,其不同时期的文明观有何特征,对日本社会及其发展道路的选择产生了哪些影响?本文拟带着这些思考,对近代以来日本的文明观变迁做一综合性考察。

一、近代前夜传统文明观的“动摇”

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开设幕府,日本进入近代前夜长达两个半世纪的“近世”时代。为了整治长期社会动乱形成的武士“下克上”之风,重建统治秩序,江户初期的“内治”是以“文治”为重点,朱子学成为官学,儒学修养成了任贤举能的重要标准。当时,“武士的基本教养是儒教,对他们来说,在国学和兰学出现之前,儒教不是多元文化之一,而是文化就等于儒教。”^① 中华文化的空前普及,一度使“礼乐、书数、衣服、舟车、农具、武具、医药、针灸、官职、位阶、军法、武艺,乃至其他诸种工艺技术,无不源于中华,无不习于中华。”^② 以至于“纵然知支那之外有他国,亦皆以为夷国,无圣人之道”^③。

但是,随着“西学东渐”、中国发生明清鼎革以及大和民族自我意识的成长,进入德川中后期,日本兰学的扩散、日本朱子学本身的变异以及复古国学的兴起等三股力量的推动,导致以中华为是的传统文明观出现了分化。

【收稿日期】 2015-10-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新编日本史”(13&ZD106)。

① 小岛晋治:《日本人的中国观的变化——以幕末维新为中心》,神奈川大学人文学研究所编《日中文化论集》,劲草书房2002年。

② 伊东多三郎编:《日本的名著11·中江藤树、熊泽蕃山》,中央公论社,1976年版,第333、332页。

③ 佐藤昌介编:《日本的名著25·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中央公论社,1986年版,第420页。

早在16世纪中叶,天主教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商业冒险与殖民活动已经蔓延到日本,由此日本开始接触到“南蛮人”及“南蛮文化”。进入17世纪以后,新教国家荷兰和英国接踵而至,围绕日本的市场和贸易,与西、葡展开了激烈的竞争。1639年德川幕府实行“锁国”后,西方国家中唯有荷兰取得了在日商贸特权,而日本则可以通过荷兰商人的窗口了解整个西方世界,从而形成了时称“兰学”的关于西方的知识体系。

在吸收和消化西方文明的过程中,日本的兰学家发现,相对于自己是“他者”、相对于西方又属于“自我”的中华传统文明,既非唯一,亦非最高境界,“泰西”文明亦不乏可圈可点之处。杉田玄白(1733—1817)对西方的医术推崇备至,以致发出“腐儒庸医不知天地之大,只闻东洋二三国之事,而以支那为万国之冠”的慨叹^①。山片蟠桃(1746—1821)高度评价西洋科学,称“欧罗巴之精于天学,古今万国无双。其巡视万国,尤以实见资于发明,无人可敌。”^②渡边华山(1793—1841)认为重视教学和政治二道的西洋“为唐山所不及”^③。佐久间象山(1811—1864)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精粗无遗,表里兼赅”^④的主张。横井小楠(1809—1869)则力主“明尧舜孔子之道,尽西洋器械之术”^⑤。总之,兰学家的文明观虽然并不否定中华传统文明的价值,但至少在日本人眼中被神圣化的中华传统文明观变得不那么神圣了。

在日本儒者眼中,1644年清朝入主中原是一种“华夷变态”。以此为契机,中国“失格”、中华文明的“接力棒”传到日本之手的“日本小中华”思想始露端倪。山鹿素行(1622—1685)在《中朝事实》中,首次把日本视为“中国”,而将中国视为“外邦”,

依据是日本皇统“万世一系”,而中国“王朝更替凡三十回”,“臣下诛戮国王者二十五回”^⑥。荻生徂徕(1666—1728)对中国古代文明无限崇拜,但对现实中国的看法则是“秦汉一变也,唐再变也,明三变也”^⑦,与清朝统治的中国相比,德川日本继承了古代中国的先王之道,因此日本文明不仅可以与中国文明并立,而且有了超越中国的诸多元素。“小中华”思想,构成了近代日本文明观重塑的重要起点。

德川中后期兴起的复古国学竭力神化日本,而对古来日本一贯仰慕的中华文明则采取了轻蔑态度。以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为代表的复古神道学者,通过对日本古籍《古事记》、《日本书纪》中有关神话的重释,刻意编织了一套独特的日本神学体系,其基本说教是:日本是天照大神(太阳神)缔造的神国,人种是天神所造的神孙,故日本“为万国原本大宗之御国,万事优于异国”^⑧,“日本天子实乃统治四海万国之真天子”^⑨。本居宣长(1730—1801)宣称:中国无“道”,儒家亦无“道”,唯日本是有“道”之国,故日本人不可沉迷于儒学,“欲习道者,须洗净儒心汉意,坚守大和魂。”^⑩平田笃胤(1776—1843)先是讥讽中国对待周边民族“尝以戎狄、夷狄相称而鄙之如禽兽,然其国皆为夷狄所夺。如斯大国之民,竟垂首敬待尝鄙之为北狄者为君”^⑪,继而判定清朝满族统治者已失去“中华”资格,而天皇“万世一系”的神国日本已有资格成为中华。

日本学者指出,中国是日本文化之母。近代前夜日本的文明观,原本是以中华传统文明为母体形成的。但是,随着中日两国国情的变化和西学东渐的加剧,围绕“中心与边缘”、“华与夷”、东方与西方的认知也在变化,传统的文明观已经动摇。尽管如

① 杉田玄白:《狂医之言》,《日本思想大系》64,岩波书店,1976年版,第229—230页。

② 山片蟠桃:《梦之代》,《日本思想大系》43,第200页。

③ 渡边华山:《慎机论》,《日本的名著25·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中央公论社,1986年版,第117页。

④ 佐久间象山:《省鲁录》,《日本思想大系》55,第413页。

⑤ 山崎正董编著:《横井小楠》遗稿篇,明治书院,1938年版,第726页。

⑥ 田原嗣郎编:《山鹿素行与士道》,《日本的名著12·山鹿素行》,中央公论社,1975年版,第18页。

⑦ 关仪一郎编:《续日本儒林丛书》,东洋图书刊行会,1930年版,第6页。

⑧ 石川淳编:《本居宣长全集》第8卷,筑摩书房,1972年版,第311页。

⑨ 《新修平田笃胤全集》第6卷,名著出版,1977年版,第543页。

⑩ 本居宣长:《宇比山踏》,《日本的名著21·本居宣长》,中央公论社,1986年版,第35—36页。

⑪ 平田笃胤:《古道大意》,《日本的名著24·平田笃胤》,中央公论社,1988年版,第152页。

此,直到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的衰弱尚未彻底暴露之前,日本的传统文明观虽然已经严重动摇,但是根基还在,尚未完成质的“脱变”。

二、第一次转换:明治时期的“脱亚入欧”

19世纪中叶,西力东渐使中日两国先后陷入殖民危机。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惨败,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昔日仰羡的中华不再是学习、模仿和追赶的对象,而是日本避免重蹈覆辙的“殷鉴”。1853年“佩里扣关”后,民族危机成为日本的现实,经历了“萨英战争”和长洲“攘夷”的惨痛失败后,日本的社会精英们开始醒悟与西方“力”的文明对抗徒劳无益,既然无法对抗,那就只有改变自己,以适应新的世界。德川幕府的垮台和明治政府的建立,便是日本的应对和选择。

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是明治政府强力推行的三大国策,就“文明开化”而言,它不只是一种吃牛肉、穿洋服、跳洋舞的移风易俗,而是一场与工业革命和制度改造并重的思想变革,是要改变人的审美意识和价值观,洗心革面,树立新的文明观。明治初期的“文明开化”既是一场风潮,也是一场近代文明启蒙运动,福泽谕吉(1835—1901)则是站在运动最前面的旗手,其竭力倡导的文明观不仅影响了一代日本人,而且间接影响了日本政府的战略选择和对外政策。

福泽谕吉于1875年发表的《文明论概略》,堪称一份思想观念上告别东方、投向西方的宣言。在这份宣言中,福泽合盘托出了对东西文明的认知和态度,认为“欧罗巴各国及美利坚合众国为最高文明国,土耳其、支那、日本等亚细亚各国为半开化国,非洲及澳大利亚等为野蛮之国”^①。在分析中日两国何以成为“半开化”国的原因时,福泽虽未否认儒佛“两教”在日本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发挥过进步作用,但认为“孔子以后无圣人”^②,儒家思想使人变成了“精神奴隶”^③,导致了社会发展停滞不前。鉴于昔日的“礼仪之邦”中国已经面目全非、“华夏国体”已然灭亡,而日本也是

“从文学、技术、商业、工业等最大的事物到最小的事物,从一至百以致到千,无一样能高于西洋,无一样能和西洋比拟”^④,福泽表明态度是:“唯有汲取西洋文明才能巩固我国国体,为我皇统增光”^⑤。

1885年3月发表在《时事新报》上的《脱亚论》^⑥,是福泽谕吉的又一代表作。在这篇语言犀利、行文酣畅、逻辑清晰、观点明确的短文中,前半部分论述了日本脱亚的必要性,其基本观点是:西洋文明势力强大,如麻疹一样流行不可抗拒;这种文明“利害相伴而利益常多”,对此“智者”应采取“与世俱进,一同沉浮于文明之海、一同扬文明之波而与文明共苦乐”的态度,“力助其蔓延,使国民尽早沐浴其风气”;明治以来日本顺应这一潮流,“万事皆采用西洋近时之文明”,“在亚细亚全洲开一新机杼,所持之主义唯在脱亚二字”。后半部分论述了告别“恶友”的必要性,其基本理由是:中朝两个近邻墨守成规、冥顽不化,不知“改进之道”,“傲然而无自省之念”;中朝对日本“不惟丝毫无助”,且使西洋人以“近墨者黑”看待日本,“已间接对我国的外交造成不少障碍”;为今之计,日本应“于心底里谢绝亚细亚东方之恶友”,脱离其伍而“与西洋之文明共进退”,并按照西洋人的方法对待之。

明治时期“脱亚入欧”的文明观转换,是与日本的对外政策实践相互刺激、相互印证而实现的。日本于1874年出兵侵略台湾、1879年吞并琉球、1882年引发朝鲜壬午兵变、1884年制造朝鲜甲申政变、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在为这些对外侵略扩张的行为辩解时,日本总是以“文明”为遮羞布,强词夺理地编造行为的正当性。例如,甲午战争爆发后的1894年7月29日,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日清战争是文野之战》一文,煞有介事地诡称此战“是谋求文明开化的进步者与阻碍其进步者之间的战争”,“唯以世界文明的进步为目的”^⑦。国粹主义者陆羯南(1857—1907)在1894年8月6日发表的《征蛮之王师》文中声称:清朝是“东洋一大野蛮国”,故“王师的胜败是文明的胜败”^⑧。御

① 石田雄编:《近代日本思想大系2·福泽谕吉集》,筑摩书房,1975年版,第89页。

②③④⑤ 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47、148—149、96、24。

⑥ 《日本近代思想大系·对外观》,岩波书店,1988年版,第312—314页。

⑦ 《福泽谕吉全集》,第14卷,第491页。

⑧ 西田长寿等编:《陆羯南全集》,第4卷,东京:美铃书房,1970年版,第579页。

用文人德富苏峰(1863—1957)以其主办的《国民之友》为阵地,连篇累牍发表文章,竭力鼓吹日本发动的是“将文明的恩光投射到野蛮社会”的“义战”,因此国民对战争意义的理解,“不应眩惑于兽力现象,而应掌握道义、心灵上的因果”,调子要定得“更加清深高尚”^①。显然,“文野之战”、“义战”论向日本国民灌输的思想是,文明淘汰野蛮是大势所趋,因此无论采用什么手段都符合“大义”。

甲午战争是东亚地缘政治格局发生逆转的分水岭,以此为转折点,传统的中华文明黯然失色,东亚华夷秩序亦不复存在。但是,《马关条约》签订后发生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使一度头脑发胀的日本再次清醒地认识到,打败中国并不意味着日本就能成为“东洋盟主”,列强、特别是俄国还不允许日本在东亚舞台上担任主角,日本还需要继续向世界证明其“入欧”的态度、能力和“水准”。为此,日本先是在1900年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时,首次加入列强侵华的统一行动,从而改变了身份,被正式接纳为世界列强俱乐部一员;继而与世界头号强国英国结盟,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上升为“并列于世界优等国的一流国家”^②。至此,明治时期的“脱亚入欧”可谓结出了“硕果”。

三、第二次转换:法西斯时代的“脱欧归日”

日俄战争的胜利,标志着日本开始进入真正的“大日本”帝国时代。到一战结束时,正如华盛顿会议五国海军裁军条约规定的美英日主力舰比例为5:5:3所象征的那样,日本已跻身于世界军事三强。实力对比及国际地位的变化,导致了日本自我认知及其文明观的变化,其结果是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欧化文明观为日本独善的皇国文明观所取代,进而又在唯我独尊的皇国观支配下,走上了我行我素、与世界为敌的不归之路。

欧化文明观向皇国文明观的转换经历了三十年左右的思想博弈和实践探索。一方面,日俄战争后,欧化的脚步并未停止。大正民主运动可谓政治上进一步“欧化”的尝试,当时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美

浓部达吉在《宪法讲话》中用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理论的“国家法人说”重新解释明治宪法,向“天皇主权说”提出挑战,并得到了普遍认同;吉野作造在《论宪政之本义兼论达其至善至美之途径》(1916年)、《再论宪政之本义兼论达其至善至美之途径》(1918年)等论文中,力倡民本主义思想,强调“国家在法理上属于人民”^③。大正民主运动一度使西方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广为传播,以致从1924年起出现了日本近代史上短暂的政党政治黄金期。

但在另一方面,日俄战争前后,强调日本文明价值、旨在对抗乃至取代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潮也在抬头,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其代表性主张是冈仓天心(1863—1913)的“亚洲一体论”和大隈重信(1838—1922)的“东西文明调和论”。

冈仓天心在《东洋的理想》(1903年)一书中提出了“亚洲为一”思想,认为诞生在喜马拉雅山两侧的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是“所有亚洲民族的共同思想遗产”^④,但印度文明已在本土消失,“中国由于几经覆盖全国性的王朝覆灭、鞑靼骑兵的入侵、激昂暴民的杀戮蹂躏,以致除了文献与废墟外,已经没有什么能使人想起唐代帝王荣华与宋代社会典雅的标识”,今天,将复杂的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统一起来是“日本伟大的特权”。“拥有万世一系的天皇这一无以类比的祝福、从未被征服的民族骄傲与自恃、牺牲膨胀发展而固守祖先传下来的观念与本能的岛国孤立等,使日本成为承载亚洲思想与文化的真正仓库”,即“日本是亚洲文明的博物馆”^⑤。不难看出,冈仓欲向世人传递的理念是,亚洲创造的璀璨文明已为日本所继承,因此亚洲主义的核心自然是日本中心主义。

与福泽谕吉一边倒的欧化论不同,日俄战争后骤然提升的民族自信和优越感,构成了“东西文明调和论”登场的时代背景。大隈重信及其智囊团在肯定西方文明的同时,也肯定了东方文明的价值,并把日本与东西文明的关系和作用作为重点论述。大隈认为:“如今,日本作为东洋文明的代表者,咀嚼和吸收了白人文明,并将之与东洋文明进行了调

① 植手通有编:《德富苏峰集》,第255页。

② 《教育时论》,1904年7月15日。

③ 松尾尊兑、三谷太一郎、饭田泰三编:《吉野作造选集(2)德谟克拉西与政治改革》,岩波书店,1996年版,第24—25页。

④⑤ 冈仓天心著,桶谷秀昭、桥川文三译:《东洋的理想》,东京:平凡社,1983年版,第11、14页。

和发展。”^①因此,“日本对于东洋,是西洋文明的说明者,对于西洋,是东洋文明的代表者,在融合东西文明上居于绝对主导地位”^②,并“负有指导亚洲劣等文明国家向文明迈进的责任。”^③他还在《国民读本》中写道:“我国已处于代表东亚文明,并向东洋介绍西洋文明的地位,很好地调和东西文明,进而醇化世界文明,带来人类和平,以图人道之完美,这是我国国民之理想,也是我日本帝国之天职”^④。不难看出,在大隈的东西文明调和论中,一种博采众长、调和了东西方文明的“新文明”正在日本诞生,其文明之光不仅会洒向东亚,而且将“醇化世界文明”。

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蔓延到日本后,激化了长期积存的各种社会矛盾。在“国家改造”、“昭和维新”的喧嚣声中,法西斯运动的狂飙打断了明治以来的“欧化”进程,导致了日本社会的急剧“转向”。在国内统治上,接连不断的血腥恐怖事件,终使日本于30年代中期建立了天皇制军部法西斯体制。在对外关系上,排他性亚洲门罗主义路线成为主导,继1931年武力占领中国东北后,1932年退出国际联盟,公然与国际社会决裂,沿着对外侵略扩张道路越走越远。

内外政策的“转向”与文明观的“转向”是一种表里相伴的关系。1935年发生的“国体明征”事件堪称政治上清算“欧化”的典型案。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被“天皇主权说”取代后,不仅导致了1889年建立的含有“近代”成分、东西合璧的日本式君主立宪体制崩溃,而且启动了明治后万般推崇的欧洲文明观向法西斯时代“皇国观”的回归。

以国家神道为基础构建的“皇国观”,是法西斯时代日本文明观的同义语,其思想核心是日本原本是太阳神缔造的神国,天皇有“掩八紘为一字”的特权,中华文明的继承和西洋文明的摄取,已使日本成为东方新文明的代表者,肩负着建立“世界新秩

序”的历史使命。这一狂妄而又根深蒂固的观念,可以从关东军参谋、作战主任石原莞尔中佐的“世界最终战争论”中窥知一斑。在石原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是欧洲大战,算不上世界大战。时下世界正形成以日本和美国为首的东西两大集团,当“日本完全处于东洋文明中心位置、美国完全处于西洋文明中心位置、飞机可环绕世界一周不着陆”的三大条件具备之时,便是“日莲圣人所指的统一世界的大战争”爆发之日^⑤。那将是一场决定世界命运的“最终战争”,是日本代表的东方文明与美国代表的西方文明一决雌雄的决战,战争的结果将决定“是日本的天皇当世界天皇,还是西洋的总统作世界领袖”^⑥。

法西斯时代皇国观的实践,始于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为了蒙骗舆论,日本宣称它所扶植的伪满洲国是“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1937年全面侵华后,近卫文磨政府在1938年11月的第二次声明中,首次提出了日满华合作、“建设东亚新秩序”^⑦的目标;1941年12月,日本发动了自称为“大东亚圣战”的太平洋战争,把侵略魔爪伸向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包装侵略行径的美名是要把当地人民从美、英、荷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东条英机在1942年的第79次国会演说中,公然把“建设东亚新秩序”目标提升为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和“建设大东亚共荣圈”^⑧。

四、第三次转换:二战战败后的“脱日入美”

1945年9月2日,对日作战同盟国在美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受降仪式,日本代表重光葵和梅津美治郎在降书上签字。这一刻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日本的战败投降为标志落下帷幕,同时也意味着日本帝国的灭亡及其法西斯时代皇国文明观的破产。

① 《教育时论》,1906年10月5日。

② 《新日本》,第1卷第2号。

③ 大隈重信:《经世论》,东京:富山房,1912年版,第38页。

④ 大隈重信:《国民读本》,东京:宝文馆,1910年版,第194页。

⑤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开战外交史》,第1卷“满洲事变前夜”,朝日新闻社,1988年版,第367页。

⑥ 石原莞尔:《最终战争论·战争史大观》,中央公论社,1995年版,第73页。

⑦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401页。

⑧ 《东条英机首相演说集——面临大东亚战争》,改造社,1942年版,第3—11页。

美国主导的对日政策是直接军事占领和间接行政统治。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活,从制度上铲除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根源,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美国对日占领当局强力推行了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

非军事化改革砸碎了支撑战争的国家机器,撤销了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海军省和军令部、教育总监部等军令军政机构,遣散了700万现役官兵,抓捕和审判战犯,并在国家机关和各级政府部门开展了大规模的清除军国主义分子运动。

民主化改革的宗旨是打破政治、经济和思想上的专制统治,以便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形成广泛的民主基础。在保障基本人权方面,废除《国家总动员法》、《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临时取缔法》、《治安维持法》、《思想犯保护观察法》、《治安警察法》等战前“恶法”,解散特高课警察,释放所有政治犯,承认国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及宗教信仰自由,赋予妇女选举权和参政权;在教育改革方面,普及美国式自由民主思想,严禁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及神国教育内容进课堂,禁止学校开展军训及军事教育,禁止学校设置神龛及悬挂天皇照;在经济改革方面,农地改革、解散财阀和劳动改革的实施,从制度上改变了以财阀垄断和寄生地主制为特征的战前资本主义结构,调整了劳资关系。

1946年11月3日颁布的《日本国宪法》,堪称美国在日推行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的集成,主权在民与和平理念成为战后宪法的核心。据此,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现代政治体制得以确立,理论上国民已成为国家的主人,政府是为国民服务的公仆,天皇则由昔日的“现人神”变为“凡人”,只是作为国家的象征存在而不再具有执掌国政的权能。《宪法》第二章第9条规定:“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①。

战后改革虽然是基于外力强制而非日本自愿的背景,并且随着冷战后美国对日政策的改变而出现了明显的倒退,但是改革引起的制度变化以及思想意识上对日本国民的洗脑作用依然是不可否定

的。1951年9月,美国操纵联合国片面签署了对日媾和条约,决定恢复日本的国家主权和“独立”地位,同时签署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则表明,日美两国已化敌为友,结成了同盟关系。度过战后十年的动荡期,日本经济实现复兴并走上高速增长道路,自民党也从1955年起成为长期执政的政党。吉田茂等一批保守政治家坚信,只有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绑在一起,跟着美国走,日本才有未来。事实上,战后日本重新崛起的过程,也是日本全方位向美国学习、一切“向美看”、“对美一边倒”的“美国化”过程。在美国提供的保护伞下,日本得以专注经济建设,并尽情享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科技进步成果,从而于1968年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实现了经济赶超。

历史的发展总是惊人地相似。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在世界性的日本讴歌声中,恰似日俄战争后急剧抬头的“日本主义”重演,创造了战后经济“奇迹”的日本再次找回了自信,文人政客在诠释经济成功的原因时,“发现”并高度评价了深藏于经济背后的日本独特文化即文明的力量和价值,燃起了日本文明向世界撒播的使命感。1967年,日本文化论代表人物梅原猛在《美与宗教的发现——创造性日本文化论》序言中指出:时至今日,输入的时代正在结束,创造的时代正在到来。1976年,梅原又在《日本文化论》中提出“两种文明原理”,认为“以往的欧洲中心主义文明(包括受西方文明影响而丧失主体性的日本近百年文明)已经没落,像瘟疫一样威胁着现代世界”^②,东方文明向西方文明反击的时代已经到来。1982年,中曾根康弘首相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口号,宣称日本为了实现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转变,必须提升国际化水准,而国际化水准的提升需要输出日本文化。中曾根认为:“迄今为止,我国在吸收和消化外国文化的文化‘摄取’上过于热心,而对文化‘传播’的努力却很不充分”,因此“必须下定决心,大力传播日本文化,让世界更好地了解日本”^③。的确,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人度过了一段开心畅怀的美好时光,GDP景气、日元升值、海外游热、“购买美国”风潮、

① <http://www.houko.com/00/01/S21/000.HTM>.

② 卞崇道主编:《战后日本哲学思想概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4页。

③ 中曾根康弘首相1986年1月27日在众议院104次会议上的施政演说。见田中明彦研究室网站资料《世界与日本》。

国际性“日本学”研究的兴起,如此等等,人们坚信“21世纪是日本世纪”,石原慎太郎等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他们发出“对美国说‘不’”的强大声音,这是当时的日本人踌躇满志心态的真实写照。

然而,历史又是残酷的。过度自信和高估自我文明的价值必然要付出代价。进入20世纪90年代,80年代的“繁荣”所积累的深刻社会矛盾终于爆发。面对“失去的十年”或“停滞的二十年”的严酷现实,飘飘然的日本人恢复了冷静,“反思”和“改革”成为20年来社会的主旋律,盛极一时的日本文化优越论很快就失去听众和市场。从文明论的视角观察这一现象不难发现,自20世纪60年代末期抬头的具有“脱美”指向的文明观在划了一个圈后,崇奉现实主义的日本似乎又返回到“入美”、“跟美”的原点,时下安倍政府的治国理念及其推行的“与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携手”^①的价值观外交便是明证,尽管其骨子里的日本精神并不会轻易改变。

五、结语

在近代前夜德川幕府统治的中后期,原本“以中华为是”的日本传统文明观,因中日国情变化和

西学东渐而发生严重动摇,但根基尚存;1853年“佩里叩关”揭开了日本近代的序幕,引起了史称“脱亚入欧”的第一次文明观转换。“脱亚入欧”的日本打败中国和俄国,成为雄踞世界东方的“一流”帝国,由此自恃东西文明兼容并包,是现实的东方文明的代表者,进而在军部法西斯掌控国家后,更以神国论作为包装,把所谓代表东方的日本文明进一步打造成至善至美的“皇国文明”,导致了可称作“脱欧归日”的第二次文明观转换,并在“皇国观”和皇国梦的驱动下,发动了旨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和“共荣圈”的“圣战”,直至以失败告终。战败以后,日本被迫进行了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同时接受了一次摒弃皇国观和“脱日入美”的洗脑,从而发生了第三次文明观转换,这一转化虽曾一度出现过反弹,但其文明观迄今依然在这一轨道上行进。

在日本的三次文明观转换中,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尽管每次“转换”都具有某种“质变”的性质,但新的文明观的确立并不意味传统文明观的泯灭。历史证明,每当日本的“入欧”、“入美”取得显著成效之时,往往也是其“发现”传统、甚至拾起糟粕作“精华”、试图“再造”独自文明的开始。

(责任编辑 蒋重跃 责任校对 孟大虎 宋媛)

Changes of Japanese Civilization View in Modern Times

YANG Dong-liang

(Centre for Modern World History & Institute of Japan Research,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times, the traditional Japanese civilization view, which took the Chinese culture as their model for granted, has experienced three changes, that is, model changes from Asia to Europe, from Europe back to Japan and from Japan to the United States. Each ‘change’ bears some ‘change of quality’ to some extent, but the formation of new civilization view does not mean the abandonment of the traditional one. In fact, when the model changes to Europe and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Japanese would ‘discover’ something new from its tradition and would thus attempt to reconstruct a point of departure for the ‘new civilization’ in the Japanese way. That phenomenon may give the world the following enlightenment: in adversary situation, having encouragement after feeling humiliated, keeping up with the times to adjust and renew their backward views, then one could catch up with the advanced; in favourable circumstances, in the country, one should neither conceited nor rash, but hold a rational outlook for oneself and others, which would function to maintain the prosperity of the country.

Key words: modern Japan; view of civilization; model change from Asia to Europe; model change from Europe back to Japan; model change from Japan to the United States

^① 引自2015年8月14日安倍晋三战后70周年谈话。